

涛声里的遗民心曲

朱舜水在舟山时期的诗文

□张萌 高岩

朱舜水(1600~1682),明末清初著名遗民学者,原名之瑜,浙江余姚人。1644年明亡后,朱舜水则坚定自居为遗民,不仕清廷,辗转流寓舟山群岛,后漂泊日本,终身不归。他以诗文铭记故国沦亡之痛,以讲学传播儒学典籍,影响深远。舟山群岛,便是他这段精神苦旅中至关重要的坐标。

乱世困境与精神寄托

朱舜水与舟山的结缘,始于乱世中的仓皇避祸。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南下,他从绍兴避乱入舟山,居留多年(《朱舜水年谱》卷一),将舟山作为避乱守节之所。

《朱舜水文选·行实》载:“永历五年(1651),舟山诸将疑忌,清军压近,朱舜水原本为南下安南,逆风受阻折返转而东渡日本。”这段文字说明舟山已成为他进退维谷的关键节点:故国已亡,江浙难以安顿,他只能退入海岛。

在舟山的岁月里,他的诗文反复描摹海岛的孤绝,以自然意象寄寓亡国之痛与士人坚守。《舟山杂诗》云:“孤帆随处泊,涛声夜夜寒。余生如草木,流落倚风湍。”(《朱舜水集》卷二)孤帆的漂泊、涛声的凄寒,正是其身世的写照;草木与风湍的对比,则凸显生命的卑微与坚忍。这些描写已超越景物记述,将舟山的山海气象赋予了道德与身世的双重色彩。他在另

一首《舟山杂诗》中直言:“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白日昏暗象征着天下失序,“胡虏据中原”则是对山河破碎的痛切陈述。可见,他在舟山的文字不仅是孤身漂泊的自叹,更承载着遗民群体的集体哀歌。

随着清军南下、舟山局势日益恶化,朱舜水的诗中逐渐流露出离别与远行的情怀。《舟次感怀》有“客路随潮远,孤心向海长”一句(《朱舜水集》卷二)，“潮”与“海”既象征舟山自然景观,也映射其内心况味,显示他漂泊无依、唯有东行方可寻踪。《海上集》载:“舟山军情日急,朱舜水遂由舟山启海路,东行日本。”(《海上集》卷首),可见,舟山在他生命历程中不仅象征遗民孤岛,更是其东渡求学的关键节点。

“海岛涛声”中的遗民书写

朱舜水寓居舟山时所写诗文,是其遗民书写风格形成的早期阶段。他反复使用“海雨”“孤灯”“涛声”“孤帆”等意象,这些并非单纯的舟山自然景观,而被赋予了独特的象征色彩,较之乱世漂泊心态,更偏向遗民精神的审美表达。

他在选择意象时,形成了带有遗民色彩的“意象体系”。如《舟山夜泊》所言:“海雨愁边至,山灯梦里看。”(《朱舜水集》卷二)，“海雨”成为情绪的投射,“山灯”则由夜色点缀转为身世孤守的象征。这种将

自然景观文学化、象征化的写法,使舟山风物成为情绪与道德意义的共同载体,与借景抒怀的漂泊之苦相区别,更具风格化与结构性的审美意义。

朱舜水在诗文中着重写海岛景象,塑造出带有遗民色彩的象征性意境。舟山群岛本是渔火点点、潮声相和的自然景观,但在他的笔下常呈现出沉郁肃杀的气氛。《舟山杂咏》写道:“风涛吹不断,寒声入客衣。”(《朱舜水集》卷二)“风涛”被赋予侵体入骨的“寒声”,象征遗民面对改朝换代时无处可避的政治之寒。另一句“海山无尽处,愁色共潮回”(《朱舜水集》卷二)中,“潮回”作为舟山特有的自然节律,被写成与愁绪同起同落的精神回声,自然景观由此转化为持续的道德压力。

朱舜水在舟山时期的诗文呈现出由“漂泊之哀”走向“节义之坚”的内在轨迹。初到舟山时多有身世飘零之叹,如“孤帆随处泊,涛声夜夜寒。余生如草木,流落倚风湍。”随着时局变化与精神沉潜,他的文字中出现了更强的“守节”意识。在另一首诗中他写道:“海雨清吾节,孤灯照此心。”(《海上集》卷一)此处“海雨”不再仅是愁绪的象征,而具有“濯濯清节”的道德意味;“孤灯”也从单纯的漂泊象征升华为守节之心的照耀点,标示着其精神世界的转折。

朱舜水所写舟山诗文,既是对自然风物的描绘,也是对遗民精神

的写照。他借助“海雨”“孤灯”“涛声”等舟山特有的景象,营造出浓重的漂泊意境,并在此中完成对自身精神的定位,从而走向“以身守节”的遗民姿态,再到“以文传道”的文化担当。舟山成为他人生与思想的关键转折点,也是遗民文学中独具象征意义的精神坐标。

“残山剩水”后的文明航程

在明清易代的巨变中,朱舜水坚守气节,内心郁积着深重的家国之痛、漂泊之哀与身份抉择的孤绝。这种沉郁的愁绪,在他舟山时期的诗作中体现得尤为深刻。《再题旧居》写道:“旧地空余梦,新朝未可亲。”(《朱舜水集》卷二)既显对往昔的执念,更见其不仕新朝的坚决。

舟山之于他,并非最终的落点。他在《舟次杂感》中写下“客路无乡梦,愁心逐海潮”(《朱舜水集》卷三)，“乡梦无处”与“愁心逐潮”已体现为须要远行的思绪,这一落点最终导向“居山居水,恬淡自得”的归宿。

他始终以遗民自居,即便站在异国讲坛,耳畔似乎仍回荡着舟山的涛声,于是他在诗中慨叹:“残山剩水留秦汉,异域同文识孔曾。”(《朱舜水集》卷五)“残山剩水”点明故国的残破,“同文识孔曾”则强调儒家文统的延续,正是在舟山的涛声与孤灯中,他完成了精神的涅槃。

“小小图书馆”借书证背后的红色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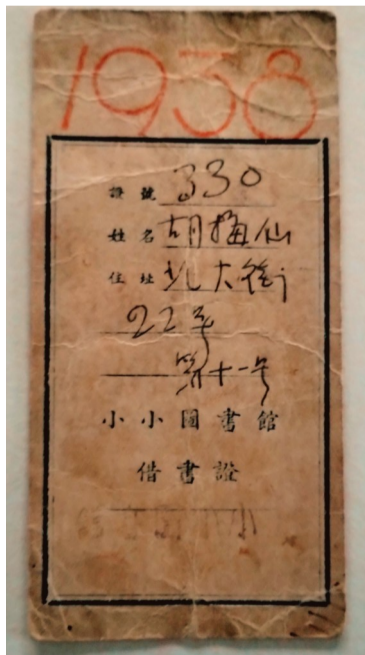
□辛舟

喜欢阅读的人,对纸质的借书证,一定记忆犹新。

笔者收藏有一张1938年的“小小图书馆”纸质借书证,这是一张长11.5厘米、宽5.5厘米,略显发黄的硬纸片,证号:330,借书证上的原主人,标明是居住在定海北大街22号的胡梅仙,当时是以经济委员身份领取的优待证。这张88年前泛黄的借书证,仿佛在无声地叙述着不同寻常的红色往事。

“小小图书馆”萌芽于1936年夏,正式成立于1937年10月。由胡时杰、李隆华先后任馆长,馆址先设在浙江舟山的定海县前街13号,后迁至邑庙前2号。图书馆取名“小小”,既表达不想显眼、麻痹敌人的用意,又显示出虽然名字不起眼,却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蕴。

当时,“小小图书馆”的书籍,完全由青年们捐献、自筹,他们还担任义务管理员。全盛期可出借的书刊有四千余册,读者上千人,除了开展借书、阅览室业务之外,还举办成人文化夜校、组织时事讨论会、代购书报等,并在定海白泉、普陀沈家门、岱山东沙等地开设分馆,还出版《小小图书馆馆刊》《文选》。图书馆的骨干和主要读者,也是抗日宣传队的



借书证正面



借书证反面

骨干,对推动定海各界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促使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共定海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曾把“小小图书馆”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正因为如此,“小小图书馆”的活动,遭到国民党定海县政府的压制。

1938年,“小小图书馆”托人,转请当时在武汉工作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题字,他很高兴地题写“定海小小图书馆成立一周年纪念”的条幅,并签名盖章。题字寄到定海后,大家把条幅挂在馆内作为纪念,还选“小小图书

馆”的手迹,制成馆额挂在大门口。“小小图书馆”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39年6月定海沦陷时为止。

1950年5月舟山解放后,留在舟山的原“小小图书馆”部分工作人员和读者,为继承“小小图书馆”的革命传统,报经定海县人民政府批准,于当年6月恢复“小小图书馆”,并通过在上海工作的许定梅,再次请郭沫若题字,他又重题“小小图书馆”。同年9月,因“小小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逐步走上了革命岗位,并考虑到解放后的情况与过去已发生根本变化,于是将全部藏书捐献给定海县图书馆而停办。重办“小小图书馆”时间虽然很短暂,但当时对活跃解放初期定海人民的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照片由作者提供)

本版与市政协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
第1310期

来稿请发

zswb03@zsnews.com